

- [45] 张飞岸：《解蔽美国多元主义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9月6日。
- [46] 关于民族国家对国家认同的依赖问题，塞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作了专门的论述。也可参阅周平：《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逻辑》和《“亨廷顿之忧”发出了一个严重的警示》，前者载于《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2期，后者载于《思想战线》2017年第5期。
- [47]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16页。
- [48] 关于国家认同构建的模式问题，可参阅周平：“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逻辑”，《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2期。
- [49] 王建娥：《族际政治：20世纪的理论与实践》，第244页。
- [50] 王建娥：“族际政治民主化：多民族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民族研究》2006年第5期。
- [51]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第125、118、1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 [52]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68、16页。
- [53]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 [54] 关凯：《族群政治》，第144页。
- [55]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论 文】

中国和土耳其之间的精神联系：历史与想象¹

咎 涛²

在这篇短文中，笔者无意探讨中国和土耳其之间实际发生的经贸或政治关系，毋宁从观念史的角度，围绕“历史与想象”这一主题，选择不同历史时期的几个侧面考察和分析土耳其与中国对彼此的形象建构。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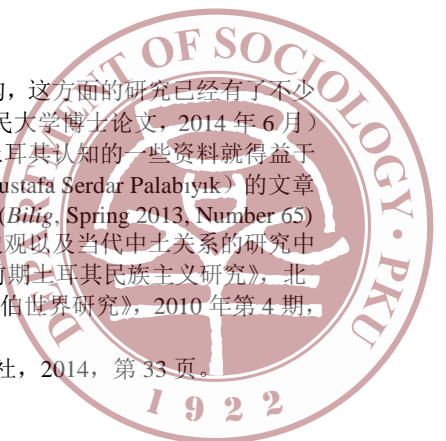
“历史与想象”所对应的分别是史实/事实与观念/建构。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至少存在两种值得研究的“现实”：具体存在的事物或者在特定时空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人物与事件）；想象中的现实（神、国家等）以及人们如何书写、记载、记忆、评价具体存在某种现实（即所谓事实背后的观念）。前者或可称之为客观现实，后者或可称之为主观现实。就人类历史而言，主观的或想象的现实已经变得日益重要。⁴本文的“历史与想象”这一主题，侧重于主观现实层面，也就是更加侧重关于现实的理念、想象及建构这个维度。

¹ 本文刊载于《新丝路学刊》，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期。

²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³ 就本研究的主题而言，它更多地涉及近代以来中国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认知建构，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在中国这方面，陈鹏的博士论文《近代中国人对土耳其的认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6月）是对前人的研究最具综合性且资料最为翔实的，笔者本文中关于近代中国人的土耳其认知的一些资料就得益于陈博士此文提供的线索；从土耳其方面来说，穆斯塔法·塞尔达·帕拉博叶柯（Mustafa Serdar Palabıyık）的文章“The Ottoman Travellers' Perceptions of the Far East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Bilgi*, Spring 2013, Number 65）是近代土耳其人之东亚观方面的开创性研究。此外，笔者关于土耳其民族主义史观以及当代中土关系的研究中也曾部分涉及双方对彼此认知问题（咎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1；咎涛：“中土关系及土耳其对中国崛起的看法”，《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4期，第59-66页）。

⁴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33页。



一、背景：并不陌生的突厥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突厥/土耳其要么在时间上属于一千多年前的过去，要么在空间上是西亚/中东地区的一个民族国家。也就是说，突厥/土耳其在时空上与我们存在较大的距离。然而，突厥是中古之前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古代中国对突厥事迹的记载对于近代以来的社会而言，除了学术研究的资料价值之外，还是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的思想来源，中国与土耳其之间的认知建构，无不涉及关于古代“突厥”的知识。

关于“突厥”一词在中文正史中的最早出现，通常的说法是出现于隋唐时代。涉及突厥的正史多成书于唐代（详下表），从唐人所撰史书的行文中不难看出，隋唐之时，突厥并不是一个新近为当时人所了解的群体。网上看到一个说法是突厥一词最早出现于公元 540 年，¹ 但不知所据为何。据岑仲勉先生考证，“突厥最初见，且有年份可考者”系《周书》卷二七《宇文测传》：“（大统）八年（542 年），〔宇文测〕加金紫光禄大夫，转行绥州事。每岁河冰合后，突厥即来寇掠……测因请置戍兵以备之。”² 学者多从此说。³ 从时间、事件、人物关联的角度看，这里的 542 年与“突厥”之事对应，确是一个较早的年份了，此亦是确切年份上能够找到的、与突厥对应的最早记录。当然，仍需考虑到《周书》成书于贞观十年（637 年）这一情况。魏收所撰《魏书》的成书时间为公元 554 年，且其列传之第八十九、九十多出现与“突厥”有关的记载，⁴ 但其卷一百二列传第九十之“西域传”等部分早已遗失，现在我们所见之《魏书·西域传》系后人据《北史》增补的，尽管《北史》也曾参阅《魏书》，但其中的细节目前已不可考。⁵ 故前述岑仲勉先生将“突厥”一词之最早可考年份定在西魏大统八年（公元 542 年），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尽管我们可以大胆猜测，该词进入汉语世界的时间应该还会更早，但目前并无确切的文献证据。⁶

¹ <http://www.baik.com/wiki/%E7%AA%81%E5%8E%A5>（2017 年 5 月 1 日）

² 岑仲勉：《突厥集史》，上册，中华书局，1958，第 15 页。

³ 如，魏良弢：“突厥汗国与中亚，”《西域研究》，2005 年第 3 期。

⁴ 如，《西域传·龟兹》中有：“东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阗一千四百里，西去疏勒一千五百里，北去突厥牙帐六百余里，东南去瓜州三千一百里。”《西域传·嚙哒传》则提到“风俗与突厥略同。”

⁵ 参见《魏书》，中华书局，1974，“出版说明”，及第 2282 页“校勘记”。

⁶ 岑仲勉先生也说，《周书》“宇文测传”中提到，以往面临突厥来寇掠的时候，通常的做法是“预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那么，“突厥之兴，更可上溯于魏也。”岑仲勉：《突厥集史》，上册，第 15 页。



(以上为涉及突厥记载较多的汉文史籍。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公元 630 年，著名僧人玄奘从高昌出发一路向西。不久，玄奘以极大的代价翻越了凶险的天山，进入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并在那里拜访了西突厥可汗——肆叶护可汗。当时，西突厥汗国对从高昌到波斯的广阔地区行使有效的控制和管辖权，在规劝玄奘留在碎叶不要再前往印度失败后，肆叶护可汗赠给玄奘 50 匹绢作为盘缠，还给他配了一名翻译，并为玄奘写了数封国书给沿途的统治者。之后，玄奘又向西到达了撒马尔罕，¹ 并从那里往南行走，最后抵达了印度。从这个历史事件可以看出，(西)突厥在当时的内陆亚洲地缘政治现实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也正是在玄奘见西突厥可汗的这一年，唐太宗大败东突厥。对于突厥人在中国史以及内陆亚洲历史上的地位之重要性，无论是古代的中国史书还是后世的学术研究，都没有太大的异议。突厥汗国曾与强盛的隋唐帝国并立争雄，对于后世突厥语不同民族的历史叙事而言，这一段历史必然要被浓墨重彩地书写。与此同时，从历史记载的丰富性来说，中文史料也是重构这一时期突厥汗国历史的最重要支撑。中古史家也认为唐代对突厥事迹的记载已经比较完备的，《旧唐书·突厥列传》开篇就说：“突厥之始，启民之前，《隋书》载之备矣……”² 当代土耳其著名历史学家图逸姗教授 (Isenbike Togan) 在其为《旧唐书·突厥列传》所做的土耳其文注疏的前言中就提到，“在与突厥人历史有关的作品中，都会提到中国文献对突厥历史的重要性。”³

然而，诚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罗新教授所言，中国史书的记载侧重是在东突厥汗国，而与中亚和西亚历史关系最密切者可能还是西突厥汗国。但为了满足突厥叙事的“完整性”，现代中亚、西亚突厥语世界的历史叙述（无论是在民族主义盛期还是其后）统统都要追溯到东突厥帝国（也就是以阿尔泰山为发祥地的古代突厥）。在罗教授看来，“中国史籍中的突厥，与现代学者所说的古代的突厥语人群，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体来说就是，“现代社会倾向于以 Turk 一词作为突厥语族各人群的通称，但在古代，它只是一个专门的指称。在鄂尔浑碑铭的突厥文碑文中，只有突厥汗国的统治人群才是 Türk，那些被征服、被统治的人群，如乌古斯九姓，就不是 Türk。”不管后来的人们如何分类，“没有任何史料证明或暗示，乌古斯九姓曾经自视或自称

¹ (美) 芮乐伟·韩森：《丝绸之路新史》，张湛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第 145-147 页。

²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四突厥上，中华书局，1975，第 5153 页。

³ Isenbike Togan, *Çin Kaynaklarında Türkler, Eski Tang Tarihi*, "sözbaşı."



为突厥。”¹

一些西方的和土耳其的学者倾向于把匈奴人直接当作是最早的突厥人，把公元6世纪建立的“蓝突厥帝国”（Gök Türk Empire）看成是最早的突厥帝国。但研究早期的“蓝突厥帝国”历史的学者伊珊（Ishan）说：“他们的起源是不清楚的，因为6-7世纪的中国史料描述的是不同的神话。他们或许曾是匈奴的一部分，他们或许曾是突厥化了的、逃避拓拔魏迫害的鲜卑人，抑或是突厥化了的印欧人。无论他们是谁，反正他们是最早使用突厥这一名号的群体。”²法国东方学家勒内·格鲁塞把占据着俄罗斯南部以及西伯利亚西部草原地带的古代民族统称为“突厥-蒙古人”，“古代的突厥-蒙古人中的统治民族是被中国人称作‘匈奴’的人。”³东方学家们根据中国的历史记载认为，匈奴人与突厥人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崇拜天（腾格里），都以狼为图腾。⁴目前似乎没有什么疑问的是：“突厥族一度属于阿尔泰人种族的一个部分，同属阿尔泰人种的还有蒙古族、满族、保加利亚人，可能还有匈奴族等。”⁵伯希和的看法是：“一般认为匈奴就是民族大迁移时期欧洲人所称的匈人（Huns）。他们不是印欧人种。现在认为匈奴或匈人属于突厥（Turc）系，这点几成定论。突厥这个名称虽来源于一个形容词，但尚不能加以解释。⁶匈奴的统治层虽说是突厥人，但不能说匈奴或匈人联盟内部不包括伊兰人的成分。”⁷

上述现象显然很符合“历史与想象”或“史实与建构”这个主题。也就是说，在有了一个大致突厥历史和人群之概念的条件下，如何来叙述或建构它们是可以有所选择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土耳其之间因为历史记载的关系而被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因为中国古代的强盛王朝（尤其是隋唐）与强盛的突厥帝国在同一时空下竞争，且汉文史料于此记载颇多，那么，中国的王朝和历史记载就成为后世突厥语不同民族也包括西方学者叙述所谓完整的“突厥/土耳其历史”的重要参照（物）。至于中原王朝如何看待突厥，我们需要将这个问题置于传统中国的夷狄观念和华夷秩序观下来理解。

由于长期的在内陆亚洲历史上的直接接触，历史上的中国人与突厥人之间相互并不陌生。同样由于中国方面较为详细的历史记载的存在，之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对突厥之人与事并不陌生。到了近代，因为有着“同病相怜”的相似境遇，突厥与中国在历史上的关联又将被重新激活和演绎，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提及和类比。

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土认知的互构

¹ 罗新：“从于都斤山到伊斯坦布尔——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全球史评论》第十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81-82页。

² Ishan, “The Gök Türk Empire,” http://www.allempires.com/article/index.php?q=The_Gok_Turk_Empire; 按：突厥语gök有“蓝”、“天”的意思，在现代土耳其语中一般是指“天”。根据苏联学者伯恩斯坦的看法，在6-8世纪，“突厥”一词本质上没有全民族的意义，而通常是指突厥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部分，因此，碑文中提到“突厥”时常加形容词gök，按照原文的意思，“蓝突厥是对上层统治者的形容词，”gök在古代突厥碑文中是表示高贵的形容词。薛宗正：《突厥史》，第24-25页。

³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黎荔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27页。

⁴ 关于狼图腾在突厥-蒙古人之中的早期传说，可以参见韩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收入韩儒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274-299页。

⁵ 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第18页。

⁶ 根据最新的土耳其历史教科书，“Türk”这个词在历史上有很多中含义，但经过学者们的研究，关于该词的解释被认为是比较正确的：一个意思是“诞生、出现、增加”；另一个意思是“力量、强大的、有力的、成熟的”；而“突厥”一词作为一个政治名称，最早的是指“蓝突厥国”（Göktürk Devleti, 552-740）。Tarih, *Lise-1*, İstanbul, Milli Eğitim Basımevi, 2002, p. 38. 又据薛宗正，“突厥”一名是西魏译自茹茹对突厥人的称呼，习久沿用，遂成定译；突厥一词本有“帽”的含义，据此，薛氏推测“Türk”的来历似与古塞人的族称“锐帽人”（Tigra-hauda）有关，tig有“锐”的意思，它进一步音变为Türk，则有“刚锐如铁，皆堪代人”之意。薛宗正：《突厥史》，第77-78页。

⁷ “伊兰人”是公元前几世纪时生活于南俄草原及西伯利亚西部草原上的印欧种人，其中有斯基台人和萨尔马特人。[俄]巴尔托里德、[法]伯希和等著，《中亚简史》（外一种），耿世民译，中华书局，2005，第177-178页。



到了清末，随着中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开始重新将突厥（奥斯曼帝国）作为重要的时代参照和对应物提出来。在 1898 年 6 月，康有为作了著名的《进呈突厥削弱记序》，其中康有为先点题，说突厥与中国命运相近：“横览万国，与中国至近形似，比拟同类，鉴戒最切者莫如突厥矣。”¹ 然后，康有为强调中国和土耳其是同种：“突厥出自匈奴，盖殷人淳维之后，而吾同种也。昔在隋唐之世，赫然控北方数万里，亘自远东，延瀚海至于里海，奄有中亚，自蒙古前莫比强焉。”² 根据学者的研究，早在康有为撰写《进呈突厥削弱记序》之前，徐继畲就在其《瀛寰志略》中将英文的 Turkey 译为“土耳其”，且以此音译为最正，已经约定俗成为一个规范用词。但康有为非要舍“土耳其”而用“突厥”，其原因在于康有为跟当时的革命党人都看重奥斯曼帝国的镜鉴意义，但彼此的观点差别很大，革命党认为土耳其与中国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可谓“同形”，又同样遭受深重的外患，可谓“同病”。而康有为不止于关注“同病同形”这一面，他更强调的是“同种同类”。康氏曾经很推崇《泰西新史览要》一书，正是该书中提到，土耳其“即唐书所称之突厥也，历代相传仍其本名，乃近年来华人之译书者不明古史，误译作土耳其。”这便是康有为在 1896 年后用“突厥”对译 Turkey 的原因。比较来看，古代正史中史家强调匈奴/突厥在血统上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其目的在于建立某种谱系上联系，从而使得中原人陌生的对象不再陌生，也不再恐惧之，以利于经略；但康有为在这里强调的同种，目的是为了拉近两个比较对象的距离，使比较更有切近感。³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伊斯坦布尔的游记就名之为“突厥游记”也就不奇怪了，直到 1923 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康有为又重新启用“土耳其”一词。⁴

对康有为来说，奥斯曼帝国与中国的问题相似，双方又是同种同类，这样情况是“鉴戒最切者”。对康有为而言，奥斯曼土耳其人与中国有相同的命运，都是亚洲的病夫：没有机器，没有干净的水，没有好的路，没有铁路，同样地无知，没有现代世界知识，没有人权，没有议会，没有法治，没有独立，都是深陷危机。⁵ 康有为为中国和土耳其之间建立了一种同病相怜的“自家人”的感觉：“中国与突厥乎，西欧久谓为东方两病夫矣，其意谓未知孰先死也。今中国之形，与突厥同；中国之病亦与突厥同；臣编译突厥事，窃窃自危，旁皇泪下。”⁶

相对于改良派提倡君主立宪，革命党人同样也以土耳其的例子来论证中国之不可能实行立宪，而欲行立宪必先进行种族革命。早在 20 世纪初，中国的汪精卫就谈到过这个问题：

“夫中国之政治现象，与土耳其不同，故土耳其犹可言君主立宪，而中国则必不可，以民族问题为之梗也。此其故吾昔常言之矣。曰：‘土耳其国内诸民族，以突厥民族为最多数，今之握君权者，固突厥人，而为革命之主动者，亦突厥人也。故君民之际易于调和，及得宪法，而目的已达。若中国则不然，握君权者为满洲人，而企求立宪，则汉人，非满洲人也。此大异于土之以革命得立宪者矣。土之革命，突厥人为主动，而马士多利亞人赞同之。马士多利亞人之意，欲以少数民族依附于多数民族以自存也。今汉人宁能附庸于满人以自存乎？故以汉人所处地位计之，当如希腊人之谋独立，乃为合于正义。希腊以文明民族，而被政府于土耳其，与汉人被政府于满洲同也。希腊民族受土耳其压制之时，知谋独立，不知望土之立宪，惟其民意如是，故终有独立之日，此实与现时中国之革命党，同一心事，而亦中国人所当同趋于此一途者也。不惟希腊而已，卜加利亚人、罗绵利亚人、罗美尼亚人、孟颠匿古鲁

¹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第 298 页。

²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第 298 页。

³ 到 1930 年代，仍然有学者翻出唐代安置东突厥一事，论述土耳其与中国之同种。

⁴ 参见戴东阳：“康有为《突厥游记》稿刊本的差异及其成因”，《近代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

⁵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第 299 页。

⁶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第 300 页。



人，其以异族受制于土，与希腊同，而其谋独立，亦与希腊同，是可谓能尽民族之天职者矣。中国人对之，其知愧胡？其可自同于马士多利亞人乎？’”¹

汪精卫所谈的背景是 1908 年的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命。

就在改良派和革命党人纵向求诸历史、横向对比自我与他者、建构起一个“同病同形”、“同种同类”的突厥/土耳其之时，奥斯曼帝国也与中国发生了不同形式的联系，首先是在这之前接待了阿古柏的信使，并册封阿古柏为“埃米尔”，此为对中国国家主权之直接侵犯，反映了奥斯曼帝国对泛伊斯兰主义利用，这一情形为当时的中国大臣所知悉；另外，20 世纪初也有一些土耳其人来到东亚，留下了他们的观感，向其国内报告了东亚的情况，这其中就有他们关于中国的具体看法。

1860-1920 年代，在奥斯曼-土耳其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19 世纪 60-70 年代，入侵新疆的阿古柏建立了地方政权，并与在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皇帝哈米德二世建立了联系，接受其册封。这一关系反映了泛伊斯兰主义在奥斯曼帝国的上升，也就是帝国开始利用泛伊斯兰主义拉拢世界范围内不同地区的穆斯林，以反帝反殖为名，实际上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威。与此同时，在中国方面，正在进行“海防”与“塞防”之争的李鸿章与左宗棠也注意到了土耳其对于新疆问题的介入。1874 年，李鸿章就通过外国报纸和探子得知了这一消息，并在《奏陈方今天下大势暨分条复陈练兵造船筹饷各事》中，向皇帝汇报了此事，他说：“屡阅外国新闻纸，及西路探报，喀什噶尔回酋，新受土耳其回部之封”。²左宗棠也得知了这一消息，他在奏议中谈到：“喀什噶尔回酋之叛附土耳其，与俄英两国通商，闻海口已刊入新闻纸。此间尚无闻见。果如新闻纸所言，喀什噶尔附其同教之土耳其，与英俄通商，我既兼顾不遑，无从顾及，则将来恢复后，能否久守，原可姑置勿论。”但左宗棠认为土耳其不足为虑：“至土耳其，即都鲁机，国于印度之西，距伊犁、喀什噶尔万数千里而遥……土耳其国势分崩离析，非夫寰宇中央之旧矣。”左宗棠其实也意识到了到了土耳其作为伊斯兰国家与回民之间的关系。³奥斯曼-土耳其人对阿古柏的支持，成为后世中国人关于土耳其利用“双泛”在内陆亚洲推行扩张主义、干预中国内政的一个历史阴影。至 1933 年分裂主义势力在喀什噶尔组织“独立政府”，国人对于其背后的土耳其因素的认知就更加清晰了。至此，近代土耳其人利用“双泛”干预中国新疆事务的负面形象已然成型，且影响至今。

在 1890-1910 年代，有些土耳其人旅行到东亚，据认为其中就有奥斯曼政府派出的间谍，他们在新疆办学，宣传泛突厥主义，有的被中国政府抓捕和驱逐。⁴这些人也留下了一些游记类资料，其中他们描述了中国和日本的不同。除了记述当地的风土人情，这些游记文字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揭示出当时的土耳其穆斯林如何看待东亚。简单来说就是，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人非常赞赏日本，同时非常鄙视中国。他们认为日本人是好的穆斯林，是东方国家的榜样，因为它既现代又保持了传统；而中国是没有希望的，是肮脏和贫穷的；他们指出，日本人只是不知道自己是穆斯林，但日本很容易变成穆斯林国家。

奥斯曼-土耳其人赞赏日本的原因很简单。一是他们了解到也看到日本人实现了国家的进步（也就是后世所说的现代化）和强大，日本甚至打败了曾经强大的中国（1894）和俄国（1905）；二是日本人非常地文明化，尤其是很讲究卫生，为人彬彬有礼，非常讲究生活的细节；三是日本人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没有丢掉自身的传统，不管是在服饰还是习俗方面，日本人仍然珍视自身的传统。这几个原因，使得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人不仅非常地羡慕日本人，而且从穆斯林

¹ 汪精卫：《汪精卫集》，上海：光明书局，1929 年 10 月初版，第 201 页。

² 转引自陈鹏：《近代中国人对土耳其的认知》，第 327 页。

³ 转引自陈鹏：《近代中国人对土耳其的认知》，第 327-328 页。

⁴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69-170 页。



的立场对此进行了阐发。

对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说，他们之所以如此看重日本，除了认识到它的先进、强大与文明之外，更重要的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把日本视为黄种人的骄傲，视为东方人和亚洲人的骄傲。同样面临列强压力，同样在追求现代化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尽管对自身问题的认识非常深刻，但是，并没有实现日本那样的进步，尤其是感觉到帝国的问题重重，要达到日本的高度，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实现的。但是，作为自我定位在亚洲和东方的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在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群体意识，那就是，东方人的落后与西方的进步，使得东方民族普遍地处于水深火热的危机之中，东方人面临失败和灭亡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东方人必须团结起来。这种团结，最初是一种泛伊斯兰主义的主张，即团结起所有的穆斯林来，进行圣战，对抗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几乎与此同时，他们发现了日本，就顺势把日本当成了东方人的领袖，认为，只有日本有能力带领东方人走向进步并战胜西方人。

这些土耳其人内在地具有一种本质主义的东方性视野，即东方注定是不同于西方的，东方民族可以像日本人一样通过学习西方，变得更为强大，但不一定必须成为西方那个样子。他们从日本人那里看到了希望：一是日本突破了中华文明的世界秩序，这是它本来就隶属于的那个世界，日本对其完成了突破和超越；二是通过日俄战争，作为黄种的、亚洲的和东方的日本人，战胜了白种的、欧洲的和西方的俄国人，土耳其人对此欢欣鼓舞：日本以实践证明，东方超越和战胜西方是可能的。

关于中国，这些奥斯曼-土耳其人也有很多记载和断言。但普遍的感受是，中国大而虚弱，中国人多而散漫，没有法治，尤其是中国人非常脏，不讲究个人卫生，卑琐又不懂礼貌。这些都与日本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他们对中国不抱希望。¹

1923年土耳其独立战争的胜利，使得土耳其在中国声誉鹊起，因为中国正日益陷入军阀混战和分裂主义，土耳其的独立和现代化可以为中国的榜样，也有不少的中国先进人士时时拿土耳其做参照谈论中国。

1920-1930年代，正是土耳其完成独立革命并在国父凯末尔领导下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建设现代国家的时期。中国人对于凯末尔的崇拜与宣传是不遗余力的，出现了多本（篇）研究、介绍凯末尔的专著和专文。1922年，《民国日报》就发表过一篇诗歌《祝基玛尔将军胜利》，讴歌凯末尔的丰功伟绩。²从这首诗歌不难发现，中国以土耳其为榜样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同认为是弱小民族。土耳其独立革命的胜利令处于军阀割据、列强环伺之中的中国先进人士感到羡慕，甚至萌生了效法和追随土耳其以谋自强的意念。

中国知识分子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对土耳其革命和变革保持了密切的关注。一直以来，在中国也有一些对土耳其民族独立艳羡不已的知识分子和年轻的历史学家，表达了对“新土耳其”的敬意。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柳克述撰写的《新土耳其》。³关于这本书在中国现代化研究史上的地位，林被甸、董正华曾提出：

第一部明确地以现代化进程为对象的史学专著，则是柳克述的《新土耳其》……中国和土耳其近代以来有共同的遭遇，两国探索现代化的经验教训足可相互借鉴。……柳氏自述其撰写《新土耳其》旨在“警策国人”、“唤醒民众”。统览全书，其希望中国走向独立富强与现代化的立意是十分鲜明的。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明确地使用了“现代化”这一几十年后

¹ 以上相关观点散见于 Ahmet Kemal İnkul, *Çin-Türkistan Hatıraları ve Şanghay Hatıraları*, İstanbul: Ötüken, 1997; 以及 Adil Hikmet Bey, *Asya'da Beş Türk*, İstanbul: Ötüken, 1998. 亦可参见 Mustafa Serdar Palabıyık, "The Ottoman Travellers' Perceptions of the Far East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² 恶石：“祝基玛尔将军胜利”，《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第9卷第22期。

³ 柳克述：《新土耳其》，商务印书馆，1926。



才开始流行于西方的新概念。¹

出于跟柳克述相似的目的，解放前的中国学者对土耳其现代史的研究投入了很大的努力，出版了相当丰富的研究论著²。比如，在1928年，程中行编译了《土耳其革命史》一书。程氏在该书的“译者自序”中说：“数年以来，国人但知土耳其革命之成功，而不明其成功之所自，国人但忧吾国革命之尚未成功，而不能通力协赞成功之原则。是书本旨，虽在铺陈土耳其革命之事迹，而国人读是书者，不可不于其成败之点，反复三致意焉。”³1948年，边理庭编著了《新土耳其建国史》，在该书第一部分，作者就论证土耳其是黄色人种，其用意很明显：“……我们说土耳其民族乃是黄色人种的血胤。黄色人种在亚细亚洲的东西两端，建立了两个大国家——中华民国与土耳其，东西辉映，为世界人类生色不少。为黄色人种尤其生色不少。”⁴限于篇幅，其他著作不赘述。

在1920-1940年代，土耳其作为中国的榜样，左派和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有不同的看法。蒋介石想做中国的凯末尔，民族主义者呼唤中国出现一个凯末尔。⁵共产党人如瞿秋白、李维汉、恽代英等都曾赞扬过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独立革命，将其视为世界社会革命的一部分，强调其反对帝国主义的一面，认为同为“病夫”的中国人民应该学习土耳其，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实现独立与复兴。⁶但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土耳其革命性质的深入认识，尤其是凯末尔党人迫害土耳其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转而批评土耳其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没有改变劳苦大众的地位。到1920年代中后期，中共及左翼人士对于凯末尔革命的批评逐渐升级。

1924年，瞿秋白就对凯末尔革命提出了批评。在他看来，凯末尔党人消除了原先的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因素，完全走向了资本主义。他首先指出了革命初期，土耳其的革命运动利用了左派的哈勒党和共产党，表面上与他们进行合作，但当他们自己地位稳固和战胜希腊人之后，政策发生了变化，渐渐有和协约国妥协的趋势，用各种方法摧残左派。“……仍旧又回到大土耳其主义和大回教主义去了……变了军政独裁的统治……”，政权也就完全到了资产阶级手里，富豪巨商成为国民运动的中坚，农民的租税却丝毫没有减轻。总之，“一九二二年土耳其战胜希腊之后，土耳其国民运动派的资产阶级性便完全表露出来了，国民大会政府若要巩固国民革命的胜利，必须有赞助劳动阶级的勇气……”。⁷

1925年国民党右派戴季陶连续发表文章，反对孙中山制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污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瞿秋白就此写下了其著名的文章《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对戴季陶的反动观点进行分析批判。在文章中，瞿秋白引用戴季陶的话说：“第三国际往往恨……土耳其国民党的反共产政策太过辣手（枪毙、监禁），而不晓得反乎民族……需要的策略，本来没有成功的可能。”瞿秋白批评说：“这更是高压政策的威胁，政权还未到手前之预言的威胁！土耳其共产党的组织，本来不甚好，正因为阶级斗争的工作太弱，使土耳其国民党

¹ 林被甸、董正华：“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

² 董正华：“Chinese Views of Atatürk and Modern Turkey”，载于Ankara Üniversitesi Siyasal Bilgiler Fakültesi（安卡拉大学政治学系）编：《Uluslararası Konferans: Atatürk Ve Modern Türkiye》（《“阿塔图克与现代土耳其”国际会议论文集》），Ankara Üniversitesi Basımevi, 1999, pp. 669-675.

³ 程中行编译：《土耳其革命史》，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版，“译者自序”。

⁴ 边理庭编著：《新土耳其建国史》，独立出版社，1942年1月第一版，第6页。

⁵ 到30年代，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化，把蒋介石视为土耳其之凯末尔者大有人在。

⁶ 黄志高曾经撰文讨论1921—1925年中国共产党对凯末尔革命的观察与反应问题，认为中国与土耳其的同病相怜，以及凯末尔革命在苏俄援助下的成功，均促使中共高度关注凯末尔革命。但中共对凯末尔革命的评说，又反映了苏俄在中国寻求盟友，与孙中山合作的战略意图。这就决定了中共的论说是具有选择性的，对凯末尔的转向和反共，有意无意地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遮蔽。黄志高：“1921-1925年中国共产党对凯末尔革命的观察与反应”，《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⁷ 瞿秋白：“国民革命之土耳其”，《新青年》(季刊)，1924年第4期，第44-60页，后此文又以署名“秋白”的名义分四期连载于《民国日报·觉悟》上，1925年第2卷第12-15期（2月12-15日）。



能于利用农民工人的赞助而取得政权之后，立刻反过来压迫共产党及工农群众——所谓土耳其的‘民族文化’也许‘恢复了，光大了’，可是土耳其人依旧受压迫。这种国民革命，便是戴季陶所要实行于中国的！”这里，瞿秋白是以土耳其革命的不彻底及土耳其国民党（共和人民党）对土耳其共产党的高压政策来类比戴季陶的主张，瞿秋白强调的是，土耳其革命虽然成功，民族主义虽然恢复和光大了土耳其的民族文化，但土耳其人民依然受压迫，基于此种类比，戴季陶的国民革命主张并不能带来人民的真正解放。这里，土耳其被构建为一个反面教材，成为中共批判国民党人的武器。¹

凯末尔党人对土耳其左派的态度和行为也影响到了中国革命。罗福惠在论述苏俄（联）对孙中山的援助既迟又少的原因时，特别谈到了土耳其民族运动的阴影这个论题。罗文指出，苏俄（联）对凯末尔革命给予了道义上、物质上的巨大援助，使得土耳其的民族解放斗争很快取得胜利，但土耳其并没有对苏俄（联）一边倒，反而与苏发生高加索的领土争执，并开始迫害共产党人，这些使得苏共感到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即使成功，也未必一定能把这一运动转变或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相反很可能发生分裂。故在 1922-1925 年，苏俄（联）和共产国际中对援助孙中山的国民党持谨慎态度，始终担心他会成为凯末尔第二。²

三、土耳其民族史观下的突厥与中国

现代土耳其人在族源问题上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内亚想象，而这个想象既要利用汉文史料予以支撑，同时必然地与中国发生历史的密切关联，也就是说它在当代仍然需要重新“想象”和构建历史上中国与突厥的关系。大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中土两国领导人见面时，土耳其人习惯于说“中土两国人民在 2000 年前就是邻居”之类的话。³

土耳其的民族主义叙事不但无法回避而且还必须着重探讨古代突厥的历史。究其原因来说，主要是由于土耳其人作为一个讲突厥语的部落所创建的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它在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之后，必然面临着如何重构自身历史的问题，这是东方民族主义的通例。当然，土耳其有其特殊性，如法国学者库伯所言：“历史上，从阿尔泰到维也纳，土耳其人所见到的是其祖先在一条绵延长远的迁徙之路上不断前进。在半路上，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与之相互融合。他们成为伊斯兰教的携带者与传播者，伊斯兰教也给了他们一份中东遗产。以前定居在安纳托利亚，后来又到过巴尔干的土耳其人，与这片土地过去以及在其上所生活之人民必定延续着一种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在 20 世纪初便上演了一系列悲喜剧。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混乱的土地关系（这一关系自身成为了历史故事的基础），在一过程中，必然出现一个认同的问题，而在历史教科书里，也有义务去面对这个问题。”⁴ 笔者在关于土耳其民族主义叙事的研究中曾指出，现代土耳其的民族史观既有一般民族主义史学的政治性和复古性，同时又植根于土耳其民族的特殊性。⁵ 土耳其的特殊性在于，如果要追溯当代土耳其民族的历史渊源，它不可能回避追溯到内亚的历史。在库伯看来，生活在安纳托利亚的当代土耳其人，他们还有一个被赋予了故乡（anayurt）之名的地方，他们对那里并不熟知，但那是土耳其人时不时在梦中可以转移思乡之情的起源地，这也是土

¹ 此文曾收入 1925 年 9 月《向导》周报社出版的《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一书。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1925 年 8 月），《瞿秋白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 196 页。

² 罗福惠：“苏俄（联）对孙中山的援助为何既迟又少？——兼论土耳其民族运动的阴影”，《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2 期。

³ Barış Adıbelli, *Osmanlıdan Günümüze Türk-Çin İlişkileri*, İstanbul: IQ Kültür Sanat Yayıncılık, 2007, 参见该书扉页上土耳其和中国领导人讲话的摘录。

⁴ Étienne Copeaux, *Türk Tarih Tezinden Türk-İslam Sentezine*, Tarih Vakfı Yurt Yayınları, 1998, p. 7.

⁵ 咎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 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1。



土耳其官方认可的历史叙述。¹ 治古代中亚史的专家弗莱（Richard N. Frye）也曾说：“当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居民有两个根源：安纳托利亚和内亚的阿尔泰山区。这两个地方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代土耳其人及其文化。”²

那么，在土耳其的历史叙事中，中国又是如何被表述的呢？

我们首先来看民族主义盛期的中国“想象”。我说的民族主义盛期指的是凯末尔主义时代，从历史书写的角度来说，它涵盖了 1930-1940 年代。这个时期的土耳其提出了一种“土耳其史观”（*Türk Tarih Tezi*），该史观认为，世界上最早的人类出现于中亚，中亚最早的民族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将自己的伟大文明传播到了全世界，故世界各大文明皆是土耳其人的创造。³

土耳其史观讲到了从中亚迁出的土耳其人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也讲到了仍然留在中亚地区的突厥人的活动。将故乡确定在中亚地区后，土耳其史观首先要处理的就是突厥人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因为在中亚及迁徙出来的土耳其人，无论是在地缘政治上还是在历史记载中，都主要且首先是与中国人发生最密切的关系。

在前述史观的指导下，土耳其的官方历史教科书“论证”了土耳其人如何影响中国文明：“在中国没有一个单一的人种。中国最早的居民来自两个不同的人种。其中一个本是本地人，另一个则是来一群自中亚的、成为高贵阶层的、作为文明创造者和战士的人。实际上，自历史翻开它的第一页以来，中国就持续不断地遭受到侵略与攻击，这些攻击总是来自土耳其人。特别是在中国北方，大批的土耳其人就不断地从最古老的国家中迁徙到这里来。在中国西部的甘肃省，今天被称为中国人的数百万人，还保留着单纯的土耳其因素。”“中国的政治史是从‘五帝’时代开始的。其中的第一个皇帝就是伏羲。是伏羲首次把中国组成了一个国家来管理。五帝时代在中国统治的是公元前 3000 年前。伏羲出生在中国甘肃。而土耳其人早在公元前 4000-5000 年前就进入到此地，并定居下来。”⁴“他们又用类似的方法来说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创立者都是土耳其人，连秦始皇也是土耳其人。在写到汉朝的时候，没有办法证明汉朝皇帝也是土耳其人，他们就把逻辑转移到‘中外’关系上，说：“中国皇帝最害怕的就是匈奴帝国。……中国受到极大的压力和摧残。”⁵“公元 3 世纪以后，中国处于不同的土耳其国家以及成吉思汗的统治之下。14 世纪，一个本土的领袖创建了一个王朝（明朝）。它终结了成吉思汗的国家。”⁶

在土耳其人的历史叙述中，直到今天，都将匈奴的历史作为突厥人或土耳其人的历史来对待，而且认为匈奴帝国是突厥人建立的最早的国家。1930 年代的历史教科书中说：“突厥人在很久以前的不同历史时期从中亚迁出，在不同大陆上建立了很多国家，类似地，留在故乡的那些突厥人也在不同时期建立了名称不同的国家。这其中所知历史最为古老的就是亚洲匈奴人-突厥帝国。”⁷到了 21 世纪，土耳其人的历史教科书中是这样表述的：“中亚所知最早的有组织的突厥国家是匈奴人建立的。他们是蓝突厥人和回纥人的祖先。匈奴人在公元前 3 世纪强大起来。匈奴人是其邻居尤其是中国人感到害怕的力量。”⁸

在民族主义极盛时期，土耳其史观强调，从文明的角度来说，那些因干旱而迁徙的土耳其人在东方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明，而且为中国文明的发达和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⁹土耳其人赋予匈奴的几个特征值得指出来，那就是历史悠久、文明、强大且令中国害怕。在 1930 年代的历史

¹ Étienne Copeaux, *Türk Tarih Tezinden Türk-İslam Sentezine*, p. 9.

² Richard N. Frye, *The Heritage of Central Asia: From Antiquity to the Turkish Expansion*. Princeton: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1998.

³ 管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 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

⁴ *Tarih*, I, 原版为 Istanbul Devlet Matbaası 1932, 最近的第三版为 Istanbul Kaynak Yayınları, 2001, p. 56.

⁵ *Tarih I*, p. 58.

⁶ *Tarih I*, p. 58.

⁷ *Tarih I*, p. 63.

⁸ *Tarih, Lise-1*, Istanbul, 2002, p. 39.

⁹ *Tarih I*, p. 28.



教科书中，土耳其人强调了匈奴在法律、商业、政治组织等方面的先进性，尤其是提到，“中国人从匈奴文明受益良多。中国最早的历法就是从突厥人的。”¹在 21 世纪的历史教科书中，土耳其人强调了突厥人与中国关系十分密切而且不断地发生战争，在文化上，土耳其人将马文化传给了中国，并在天崇拜方面影响了中国文化。²

简单总结一下，在土耳其人的历史观中，不单是将中国汉文史籍所重点记载的东突厥帝国作为整个突厥历史的重要部分，而且还将在汉文史籍中被多样化了的突厥起源进行了“整齐划一”，制造了从匈奴到拓跋再到突厥、回纥的叙事线索，从而将土耳其的民族历史直接上溯到内亚历史上的匈奴人，由此，匈奴人也就成了匈奴-突厥人。这些内亚游牧民族长期竞争的对象就是中国的中原王朝，因此，在土耳其的民族主义历史叙事中，它总是要首先处理中国，在其脉络中，中国成为经常被攻击的、只有防御能力的对象，而且在文明上，中国也向土耳其人的不同祖先学到了很多。从这个例子也不难看出，任何国家的民族历史难免都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

那么，对于相似的问题，中国人又是怎么看的呢？前述罗新教授已经指出，中国历史记载的突厥之范畴非常狭窄，与国际上尤其是土耳其将突厥泛化的倾向不同，中国倾向于将突厥做专门化的处理。薛宗正指出：突厥是一种民族专称，而非民族泛称，“突厥”一词的概念应严格限定在儒尼碑文中以阿史那氏为核心的蓝突厥，它是一个历史地产生、历史地消亡了的古代民族。“六至八世纪乃突厥民族最为活跃的时期，八世纪以后，东、西突厥的汗统都已断绝。……阿史那氏统率的突厥残部虽仍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但已不复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了。至迟于十一世纪，东、西两大支突厥部落相继消失了。其后裔加入了所在地的其他部落，改用了其他民族、部落的名称，与之混血，开始了新的历史航程。”³

薛宗正曾批评了国外学者的观点，他指出，西方学者的共同弱点是：“……以语言学的优势掩盖了历史学的劣势，过分倚重波斯、阿拉伯文献而黯于汉文史料，结果导致突厥外延的无限扩大与突厥史研究范围的模糊不清。‘突厥’似乎已不是一个有其明确限定的历史古族名称，而是泛指西至鞑靼尼尔海峡，东至河西走廊的庞大突厥语族，甚至变成连历史上的匈奴、蒙古都可囊括在内的北亚中亚游牧民族的共名。这一理解是根本错误的，我们不应盲从，而应批判地对待。”⁴薛氏指出，突厥民族与突厥语族是有明确区别的两个范畴，而西方学者却通过所谓的“突厥学”研究（薛氏不承认突厥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混淆了这两个范畴，“……以语言学研究顶替和取代了历史学研究，得出了近世突厥语族诸族皆为突厥的后裔，拥有共同历史，共同文化的错误结论，”客观上为泛突厥主义提供了思想上的来源，各国的泛突厥主义者一直利用突厥学歪曲历史。而实际上，“历史上的突厥民族同现今世界上的突厥语族完全是两回事，前者并非后者的共同祖先，后者亦非前者的直系后裔，二者的联系只不过是语言族属关系相近而已。”⁵

事实上，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并不直接的史观交锋，而其背后的政治原因是明确的，即关于泛突厥主义的问题。⁶

在当代，泛突厥主义、伊斯兰和现代性共同影响着土耳其对中国的想象与认知。中国人提起土耳其会想起古代的突厥和当代的新疆问题，当然也包括土耳其足球、肚皮舞，等等。在信息化的时代，这些元素的影响会呈现共时性，使得国人对土耳其的历史和现实的认知与想象呈现更加多元的特性。但不论何时，自古以来，中国在突厥/土耳其问题上的观念，当然也包括土耳其人关于中国的观念，都难免带有自我中心主义的特点。

¹ *Tarih I*, p. 66.

² *Tarih, Lise-1*, Istanbul, 2002, p. 62.

³ 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 698 页。

⁴ 薛宗正：《突厥史》，第 23-24 页。

⁵ 薛宗正：《突厥史》，第 25-29 页。

⁶ 参见咎涛：“从历史的角度看‘双泛’”，《大观》，第五辑，2011。

